DOI：10.13240/j.cnki.caujsse.20251013.006 网络首发时间：2025-10-14 10:06:17 网络首发地址：https://link.cnki.net/urlid/11.4984.S.20251013.1

学人与学科: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的早期发展(1905—1949)

邓世华

[摘 要] 2025 年,中国农业大学迎来建校 120 周年与社会学学科建制 30 周年。回溯历史,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的知识生成远早于学科建制时间,其发展轨迹始终与学校命运紧密相连,并深度嵌入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之中。本文以中国农业大学三大历史源流——从京师大学堂农科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从清华学校农科到清华大学农学院、从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到华北大学农学院——为脉络,聚焦其中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学人”——严复、李景汉、李世俊,系统梳理其学术思想与学科探索,力图呈现他们各自为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所奠定的不同传统:严复在京师大学堂所奠定的从“群学”与国家富强高度阐发农业基础地位的学理传统;李景汉在清华学校奠定的扎根乡土、强调实证调查的经验传统;李世俊在延安南泥湾探索的将教学、科研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的实践主义传统。这三种传统共同塑造了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的早期特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注重学理探究、社会调查与实践改造的学术风格与研究特色。

[关键词] 中国农业大学; 社会学; 知识生成; 早期发展

2025 年,中国农业大学迎来建校 120 周年,也是社会学学科建立 30 周年。虽然作为学科建制的社会学尚属“年轻”,但就知识生成而言,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的源流可追溯至 1905 年建校之初,其发展轨迹始终与学校命运紧密相连,并深度嵌入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农业大学是我国最早建立、具有悠久历史与优良传统的现代农业高等教育学府,其前身由三个独立的系统汇流而成:一是从京师大学堂农科发展至北京大学农学院;二是从清华学校农科发展至清华大学农学院;三是从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发展至华北大学农学院。这三个系统于 1949 年 9 月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95 年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延续至今。

本文以“学人”为中心,聚焦三大源流中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关键人物——严复、李景汉与李世俊。通过细致梳理他们的治校实践、学术思想及其在学科建制方面的努力,力图呈现他们各自为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所奠定的不同传统,即以严复为代表的从“群学”与国家富强高度阐发农业基础地位的学理传统;以李景汉为代表的扎根乡土、强调实证调查的经验传统;以李世俊为代表的将教学、科研与生产实践及社会

[作者简介] 邓世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生。

改造紧密结合的实践主义传统。这三种传统共同塑造了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的早期特质。深入研究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的早期发展历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梳理农大社会学早期的发展脉络，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农科大学社会学的知识生成机制与学术研究传统。

一、从京师大学堂农科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严复的“自居农国”思想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思想的第一个重要源头，可以追溯至京师大学堂农科到北京大学农学院这一系统，而其早期的精神奠基与思想启蒙者，当推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与教育家严复。严复(1854—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县人，是近代中国系统引介西方社会学的先驱。他所创译的“群学”一词，精准地捕捉了西方社会学思想的精髓(阎明，2004：3)，其译著如《天演论》《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等更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思想进程。值得注意的是，严复的农业观与其宏大的“群学”思想体系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这使他在中国近代农业思想史与社会学学科起源中占据了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以严复为核心，在京师大学堂农科到北京大学农学院这一源流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从宏观的、文明论的、国家治理的角度来审视农业根本价值的社会学思想传统。这一传统以“群学”为理论依托，以“自居农国”为核心主张，强调农业不仅是经济产业，更是国家命脉所系、社会秩序所依、文化根基所在。它为中国农业大学的社会学思考注入了深厚的历史感、整体观与经世情怀。

(一)严复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农科的建设

严复与农科教育的直接关联，始于京师大学堂时期。1902 年，清廷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主持恢复因庚子之乱停办的京师大学堂。张百熙锐意革新，尤为注重延揽通晓中西学问的人才。严复正是在此期间受聘担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24－25)，开始介入高等教育事务。1912 年，民国肇始，政局动荡，京师大学堂面临存续危机。是年 2 月 15 日，袁世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叶可梁任农科大学监督。5 月，京师大学堂奉令更名为北京大学校，原总监督改称校长，严复遂成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各科监督改称学长，叶可梁随之出任农科大学学长(王步峥，杨滔，2005：389)。

严复高度重视农科大学的建设，在人才选用上尤为审慎。他深感“农科初分，别成局面，非得勤干不欺之士，又难置怀，故至今委决不下”(严复，[1912a]2022：222)。为此，他积极利用个人关系网络，为农科延揽人才。例如，在 1912 年 4 月北京望海楼试验场农科大学校舍即将落成之际，他特意致信其学生兼忘年交熊纯如，邀其来校任职：“世兄如喜学农，此科中若可为力，复无不为左右(道)地也。祈早夺见报”(严复，[1912b]2022：219)。农科首任学长叶可梁是严复的外甥女婿，严复对其关怀备至。早在叶可梁留美期间，严复便去信表达期望：“甥婿明年是否来京部试分科？大学中

设有农科,系罗叔蕴(名振玉,上虞人)监督,若早来,可于其中想法也”(严复,[1909]2022:440)。1911 年叶可梁学成归国,严复即函告外甥女:“甥婿学成归里,如谚所谓‘衣锦还乡’,年少前程令人健羡”(严复,[1910]2022:441)。后叶可梁应清政府学部考试,列一等第四名,被授予“进士”出身,严复闻讯立即修书道贺。当时严复正计划大力加强农科建设,拟在郊区拓宽农事试验场千亩,招聘教员 20 名,并要求用英语传授新农学。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学有专长、年轻有为的叶可梁,最终聘请其担任农科大学监督(后为学长)(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丛书编委会,2005:4)。这一系列举措,既反映了严复对农科专业人才的高度重视,也展现了其运用个人影响力推动学科发展的务实风格。

严复在任期间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 1912 年 6 月至 7 月间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停办北京大学及分科大学的动议,停办理由包括经费支绌、学生程度不高、办理未善等。此举引发了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69)。严复为此毅然向教育部提交了《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与《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力陈不可停办之理由,并针对农科大学提出了具体的改良方案。他敏锐地指出,农科当时聘任三名日本教员,年费高达一万二千六百元,成本巨大。鉴于合同即将到期,他审时度势地提出两个替代方案:一是续聘日教;二是择优选拔十余名学生派赴日本留学两年(总成本约一万二千元,略低于续聘教员),对于其余在校生,则发放修业文凭。严复倾向于后者,认为“获益当犹巨……于学堂经费及有志求学者两有裨益”。同时,他主张利用即将完工的望海楼校舍,“组织新班,招考学生,另定章程”,以英文直接教授农、林等专业课程,约需教员十二名(严复,[1912c]2014:313)。

严复裁汰日籍教员的主张源自其教育理念:“盖一国大学之设,非特以造就学生,即云养成师资人才,亦非挚论,盖将以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而有裨于一切文实之进行”。在严复看来,聘请教习“如非万不得已,总以本国人才为主”,不应聘请“一知半解之外国教员”,而应当选择“本国学博与欧美游学生各科中卒业高等而又沉浸学问、无所外慕之人,优给薪水,俾其一面教授,一面自行研究本科”,由此“吾国学业可期独立,有进行发达之机”(严复,[1912c]2014:311)。严复的农科改革方案是在当时的财政压力下寻求成本效益的最优解,成功推动了农科教育转向英文教学和派员留学,其改革核心是造就农科学生、养成农科师资人才。最终,在全校抗争尤其是严复据理力争之下,教育部放弃了停办计划,并部分采纳了其建议处理学生与外国教员事宜(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69)。严复不久后因北京大学教职工薪资纠纷去职,尽管担任总监督及校长职务不足八个月(1912 年 2 月至 10 月),但其在任期间对农科大学的建设、发展和改良产生了实质性的深远影响。

(二)“群学”旨归与“自居农国”的救贫方略

严复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其思想体系中很早就包含了对农业发展与社会治理关系的深刻关注。这种关注不仅体现于他在北京大学农科的具体办学实

践，更植根于其系统构建的“群学”理论体系之中，并最终凝练为“自居农国”的治国方略。

严复将“群学”定义为“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严复，[1903]2014：371)，即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变迁规律以理解历史、预测未来。“群学”宗旨在于“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其基础则是以科学方法统合各类学问，构建有机、连续的知识谱系(马学军，2021)。严复认为，“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这里的“诸学”包括“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的数学、名学(逻辑学)，“知因果功效之相生”的力学(物理学)、质学(化学)。但掌握此四学尚不足以洞察复杂深远的事理，故还需天学(天文学)、地学(地理学)、人学。人学作为“群学入德之门”，分为生学(生物学)和心学(心理学)(严复，[1895]2014：8)。

那么，农学在“群学”的知识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严复认为，“群学之目，如政治，如刑名，如理财，如史学，皆治事者所当有事者也。凡此云云，皆炼心之事。至如农学、兵学、御舟、机器、医药、矿务，则专门之至溢者，随有遭遇而为之可耳”(严复，[1898a]2014：361)。可见，在学科分类意义上，严复视农学为高度专业化的应用性学科，是个人可根据需要学习的“专门之学”，并非研习“群学”本身所必需的基础学科。然而，所有专门之学所探究的道理，最终都应服务于“群学”的目标，“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群学”的终极旨趣在于实现社会治理的完善，即“修齐治平”。

“学问之要归”、民本、有机与演化是理解严复群学思想的四个关键维度(马学军，2021)。如果说在作为“学问之要归”的“群学”学科体系中，农学是服务于“群学”终极目标的专门知识，那么，在“群学”另一核心意涵——有机体论——的层面上，农业对于实现“修齐治平”则具有基础性、关键性的意义。严复深受斯宾塞影响，将社会视为有机体，“斯宾塞以群为有机团体，与人身之为有机团体正同。人身以细胞为么匿，人群以个人为么匿。最初之群，么匿必少”(严复，[1913a]2014：428)。“么匿”即英文 unit，也就是说社会有机体如同生物有机体，拥有基本单元(个人/细胞)，并发展出类似血脉、器官、神经中枢的结构与功能分工。“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严复，[1898b]2014：251)，社会有机体的健康运行依赖于不同职业领域的精密分工协作，而每个领域都需要其专门的学问支撑。

而严复“群学”追求的“修齐治平”，其核心意涵正如史华兹(1996：218)所概括的，在于“寻求富强”。晚清以降，国家财政枯竭，民生凋敝，农病、商疲、工饥、士人进身无阶，传统四民皆陷于贫困。在严复看来，“救贫无术，则一切进化求治求富强之事皆废”(严复，[1904]2014：391)。“求富”与“救贫”二义相伴而生，如何“救贫”构成严复思想的核心关切。在《原贫》一文中，他明确将中国贫困归咎于官本位对人才的束缚，致使农工商领域“无秀杰挺出之家”(严复，[1912d]2014：209)。史华兹(1996：219)强调严复寻求富强的途径在于释放个人能力，实际上严复不仅主张释放

个人能力,更强调必须将这种能力从“士”的单一轨道中解放出来,引导至农工商等生产性领域,方能实现“救贫”。

在逻辑上将人才解放至生产领域后,严复进一步辨析了农、工、商三者的关系及其在中国的优先性。通过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分析——“法律不明,民德未进”“教育不施,民智弇陋”“国权未收,地势大异”,他断言除煤铁等少数行业外,中国大规模发展工业的条件远未成熟(严复,[1913b]2014:212 – 213)。因此,严复强烈反对辛亥革命后流行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实业救国”论,强调“中国农国也”,工业所需的原料依赖于农业,主张中国应充分发挥其天赋的农业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时人常认为仅从事农业生产、提供原料利润微薄,但严复以美国为例反驳:美国虽为工业强国,却也是世界最大的原料输出国之一,凭借其“广土众民”的优势,通过大规模农业生产和原料出口积累了巨额财富。中国国情(广土众民)与美国类似,因此,“使吾用其本有之知识,辟其素主之土地,善守其所得于天之分,先以原料生货之产,称雄五洲,则吾国不亦既富矣乎”(严复,[1913b]2014:213)。

这自然引出一个关键问题:中国自古以农立国,重农传统深厚,为何仍深陷贫困?严复认为症结有二:一是交通极端落后,导致土地荒芜、物产流通阻滞,国民难以分享农业收益;二是缺乏保障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表现为豪强侵夺、谷贱伤农、税收繁重、币制混乱、资本无保障等。因此,相应的解决之道在于“广交通”“平法令”(后“饰币制”并入其中)。他特别强调“广交通”是发展农业的首要前提,“凡事效法西人,往往利不胜害。唯舟车之利,尺寸皆功”,而铁路建设又在交通中居核心地位(严复,[1913c]2014:232)。

至此,严复“群学”思想指引下的“救贫”路径清晰地呈现出来,即“自居农国”。他主张中国应坚守农业本分,运用既有知识能力,以农业为立国之基,专注于农产品的充分生产,为工业国提供原料,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确立农业强国的地位,从而实现国家富强。他对此充满信心并发下宏愿:“愿吾人守所得于天之分,用其旧有之能,自居农国,治道涂以广交通,修法令以祛沮力,夫如是十年以往,而国不富者,治吾妄言之罪可耳”(严复,[1913c]2014:232)。“自居农国”并非被动保守,而是基于对社会有机体分工规律、国情比较优势和现实约束的深刻认识所提出的积极救国方略,其目标是依托农业实现“救贫”与富强,最终达成“群学”所求的“修齐治平”。

(三)改造农大的炮手:章士钊与“以农立国”

严复之后,在从京师大学堂农科到北京大学农学院的脉络中,章士钊是另一位强调农业本位价值的关键人物,其“以农立国”的主张,可以视为对严复“自居农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别号秋桐,湖南长沙人。在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向国立北京农业大学转型的关键阶段,章士钊扮演了承前启后的枢纽角色:他既是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最后一任校长,也是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的首任校长。1922

年 12 月，时任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受教育部委任，兼任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12 月 21 日，他到校发表第一次演说，阐明其改造方针："近几年来，往欧美考察，得着了一个答案，就是中国忘记了他的本身是以农立国的，当注重农业"，"我现在已经觉悟这层，所以要提倡'以农村立国'"，"我愿意来办本校的，也就是因为可以促成我的主张"（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157 - 158）。经过近三个月的紧张筹备，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于 1923 年 2 月正式改组告成。3 月 8 日，《农业大学组织大纲》发布，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正式成立，章士钊任第一任校长。新的办学宗旨明确为："改进农业及农民生活，培养各种农业专门人才，期与农民通力合作，蔚成农村立国"（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170），这与章士钊的"以农立国"主张一致。

章士钊提出的"以农立国"论，不仅重塑了农大的办学宗旨，也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反思西方现代化道路、探索本土发展路径的重要思想尝试，并对日后梁漱溟等人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梁漱溟曾明确承认章士钊在"农村立国"论述上的先驱地位："譬如民国十二年春间我在山东曹州中学的讲演，就已提出'农村立国'的话，这意思在我心里萌芽得颇早，然而这话则要算章行严先生说的。章先生因此而出任北京农大校长"（梁漱溟，[1930]2005：15）。那么，章士钊"以农立国"的具体含义为何？1923 年，他在中华农学会以《业治与农》为题发表演讲时指出，"近乃远游考览，独居深念，约为二义，以诏国人：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一也。政治二字，已归腐烂，非立业治，不足以实事求是，已乱兴邦，二也"（章士钊，[1923]2015：511）。由此可见，"以农立国"包含双重意涵：一是在文明形态上，确立一种基于"农"的整体性社会文化精神；二是在治理模式上，以基于职业分工的"业治"，取代在他看来已腐朽空泛的党争"政治"。

在办学实践中，章士钊推行多项关键举措以落实其理念：其一，公开登报征聘农业专家，迅速扩大师资队伍，改大当年教职员人数增至七十二人；其二，在经费极为困难的背景下，成功筹措可观的办学资源，1923 年全校经费达二十四万八千四百元，生均经费为一千一百五十元，远高于当时的北京大学；其三，扩大招生规模，除本科新生五十六名外，首次招收研究科生四十名，在校生总数达二百十六人；其四，重组学科体系，设立农艺、森林、畜牧、园艺、生物、病虫害、农艺化学七个学系，实施五年学制与学分制，并大力强化实践环节，设立农事试验场与推广部，切实推进"农村立国"的办学宗旨（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171 - 174）。

二、从清华学校农科到清华大学农学院：李景汉的社会调查

从清华学校农科到清华大学农学院，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第二个重要源头。这一系统为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奠定了坚实的实证调查学术传统，而其间的关键人物当

属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的奠基人之一——李景汉。李景汉(1895—1986),北京市通州区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调查学学科的先驱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主攻社会学与统计学,归国后致力于将西方社会调查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尤其聚焦农村问题。

以李景汉为核心,通过其本人的教学与社会调查研究、傅葆琛等相关学者的补充,以及课程体系的制度化设计,从清华学校农科到清华大学农学院这一系统,成功地植入并培育了深厚的社会调查经验传统。其主张通过科学的、系统的实地调查来认识中国农村的"真问题",为"改良农业社会"提供基于实证的知识基础。这为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注入了科学、求实、细致的经验研究基因。

(一)清华农科的演进与社会学视野的融入

清华在建校初期即开设农学相关课程,以满足学生赴美深造农科之需。1921 年清华学校学制改革,将学程分为文科与实科,在实科中设农林科,教授农学、土壤学与动植物学。1926 年,清华学校大学部设立生物系、农业学系等 17 系(蔡远渊等,2019:42)。此间,清华学校农业学系还与燕京大学等联合筹办了农事讲习所。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在定县设立平民学校时,清华学校农科与平教会联手,在定县推行普及"农业科学化"的工作,这是平教会与国内高等学府合作的创举(李菊花,2014:220)。

1928 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大学部农业学系一度被撤销。然而,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关注并未中断。1933 年,教育部要求清华大学增设农学院。时任校长梅贻琦对此持审慎的态度。他深受当时晏阳初、梁漱溟、李景汉等人领导的乡村建设与社会调查运动影响,决定"先办农事试验场,聘请专家研究关于农科之各项重要问题,俟研究得有结果,再行设法推行,使农民得以利用"(梅贻琦,[1933a]1993:53)。基于此方针,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于 1934 年 8 月正式成立。梅贻琦强调,农科学生必须"深入农村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农业推广,进而达到改良农村社会的目的",如此"学成后能在乡间作推行改良之实际工作,则效验可收,复兴可期。否则农科人才虽已养成,不能深入乡间,致于衰落之农村毫无裨益,则非国家提倡农业教育之本旨矣"(梅贻琦,[1933b]1993:54—55)。

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设有五个研究所,其中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组主任汤佩松曾回忆道,"这些关于与人口有关的问题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以及有关工业和经济的问题,也是我自己在昆明时期一直考虑的问题,并且常与不止局限于生理学范围以内的同事谈起。我经常同陆续内迁到昆明的许多学术机构中的友人讨论我国当时和战后经济学及社会学问题"(汤佩松,[1988]2005:918),而当时李景汉就在西南联大中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任调查组主任,所长为陈达(王步峥,杨滔,2005:918)。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复员北平,正式筹办农学院,汤佩松任院长。1947 年 8

月，清华农学院设置农艺、植病、昆虫、农化四系，其中农艺系分为作物、园艺、畜牧、土壤、农经五个组。同年拟定的四年制教学计划(后因三校合并未及全面实施)中，农艺学系的选修课程分为三组，第三组中明确列有“乡村社会学”“农村调查”等课程(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548－549)。农业经济学家、农业教育家韩德章(1905—1988)在 1934 年到 1935 年间曾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1946 年被聘为国立清华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兼代系主任，曾讲授过“农村调查”等社会学相关课程(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丛书编委会，2005：155)。1949 年，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汤佩松在总结学院工作时指出，农业经济学“在教学上学生所习的普通甚至于专门课程，大部分借重本校文法学院的社会学系同经济学系……同时我们在农业经济的研究上已经有了一个院系间的学术集会，由经济系、社会系、建筑系、工学院同农业院同仁之对于整个中国农业及农村经济问题者集中研究同讨论”(汤佩松，[1949]2005：837)。这表明，直至合并前夕，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教学与研究，依然保持着与社会学系紧密合作的跨学科传统。

(二)李景汉的社会调查及其理念

1926 年成立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是民国时期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重镇之一，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存在，其间陈达、潘光旦、李景汉、吴景超、吴泽霖等诸多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奠基者都曾在此任教(闻翔，2016)。这一学术共同体也深刻影响了同期清华其他学科的发展路径。清华农科在演进过程中所营造的注重社会调查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与社会学系的学科互动和人才交融。通过李景汉的教学与实践，社会调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学术精神，在清华农科教育中得以真正确立。因此，厘清李景汉的社会调查实践及其在清华开展的相关研究与教学活动，成为理解这一脉络的关键。

李景汉自留学归国后一直致力于将西方社会调查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在李景汉看来，要找出“一条救国的出路”，获得“建设国家之适当的办法或步骤”，必须先 “了解中国社会的真相”，包括“中国民族精神的特点，旧有的道德观念，社会组织构造的特殊”等，而这又必须从调查研究事实入手(洪大用，黄家亮，2019a：2－4)。李景汉将社会调查定义为“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调查社会的实际情况，用统计方法，整理搜集的资料(包括制表绘图，求得百分比、平均数等项)，分析社会现象构成的要素。由此洞悉事实真相，发见社会现象之因果关系(至相当程度时，即可将已经说明的事实关系归纳起来，作成定律)”。李景汉社会调查的目标不仅在于发掘“中国社会的真相”，还要根据调查结果研究“改善社会之方案”，并依据社会状况，通过适当的展览宣传，“唤起民众，使觉悟关于彼等自身待决的利害问题，使他们更进一步自动的及督促地方负责者认真的、有效率的实行拟定的方案，解决社会问题”(洪大用，黄家亮，2019a：11)。

1926 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邀请李景汉教授“社会调查方法”课程。以此为契

机,李景汉获得指导学生进行北平郊外农村调查的经验,由此其“调查的兴趣渐由都市而移向乡村”。他深刻认识到,“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家占全数人民百分之八十五。故欲发扬真正的民治精神,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非从乡区自治入手不可”(李景汉,[1926]2019:241),并断言“所以社会调查,尤其是农村调查,实在是改良社会和整顿国家的根本”(李景汉,[1927]2019:285)。1928 年,李景汉通过晏阳初,深入了解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宗旨、社会调查的意义以及定县实验区的目标与工作规划。李景汉后来回忆道:“对晏先生所讲的都十分钦佩,对定县实验也很感兴趣,觉得在这样一个较大范围内进行的社会调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我想,当时中国一共有两千个县,定县调查又如解刨一个麻雀,了解了定县,华北农村的情况也就大致清楚了”(李景汉,[1983]2019:595)。同年,他接受晏阳初的邀请,出任平教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全面主持定县的社会调查工作。其最终成果体现为 1933 年出版的巨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该书被誉为“中国近代社会调查的里程碑”,它不仅是一份翔实的数据汇编,更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界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确立。

1935 年,李景汉辞去在定县的所有职务,离开定县,到清华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与潘光旦、吴景超、雷海宗一同在北京进行社会调查,调查课题包括娼妓、宗教、报馆、公园、电影等各方面的情况。1936 年,李景汉的《定县土地调查》和《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先后发表于清华大学刊物《社会科学》(洪大用,黄家亮,2019b:604)。这一时期,李景汉在清华大学开始了其社会调查方法的系统教学工作。据清华大学校史记载,1937 年,李景汉在清华大学开设了“社会研究法入门”“初级社会调查”“高级社会调查”三门调查方法课(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1991:353 – 354)。1937 年 8 月,清华大学迁到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 4 月,李景汉随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到达云南昆明,担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8 月,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成立,李景汉担任研究所调查组主任;同年兼任云南省社会处编写《昆明市志》顾问、《呈贡县志》主编,开展昆明四县农业人口调查和呈贡县人口普查(洪大用,黄家亮,2019b:605)。从参与人员的专业性和投入程度、表格与研究流程设计的科学性、统计方法的先进性等方面来看,这次人口普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也成功探索了一条社会调查与行政工作合作共赢的道路(何雪吟,2023)。

此外,傅葆琛在清华学校农科到清华大学农学院这一系统的社会调查传统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傅葆琛(1893—1984)早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得美国俄勒冈州立农科大学农学学士学位、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学位,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乡村教育专家,著有《乡村平民教育大意》《乡村生活与乡村教育》《乡村平民教育之理论与实际》等(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丛书编委会,2005:93)。他与晏阳初渊源颇深,1918 年即在法国巴黎结识。1923 年,晏阳初在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

会，随即写信邀傅葆琛加入。1924 年底傅葆琛从美国回国后，平教会便聘请其主持乡村教育部。1927 年，傅葆琛与胡本德曾考察定县等地(傅葆琛，1983：63 – 66)。1931 年，傅葆琛受聘为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教授(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丛书编委会，2005：93)。同年，其翻译的《农夫的训练》刊于《农业经济学会会刊》第 4 期，写作的《东北的农业情形》连载于《新农民》第 4、6 期(王步峥，杨滔，2005：565 – 566)。

李景汉与傅葆琛等人所代表的从清华学校农科到清华大学农学院的社会调查的传统，以及当时的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经济系教学实践，形成了将社会学理论、社会调查方法与具体的农业、农村问题紧密结合的成熟模式。这一模式尤其强调“学生须到农村实地研究考察”“学生须到农间实地练习”，体现了对实证精神和田野实践的高度重视。1932 年的《农业经济系学程》规定学生在修习“经济学”后，需紧接着修习“社会学”课程，内容为“讲解社会学之初步原理，社会制度，社会现象，社会势力，及构成社会之分子等”(王步峥，杨滔，2005：433)。傅葆琛曾讲授“农村社会学”课程。其他多门课程也深度融合了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例如，第十二条规定的“农村调查”课程，“先讲述调查原理及方法，编制调查表格，然后实行农村之经济的及社会的调查，编制报告，分析其内容，解释其意义，学此门功课者，应兼学经济十及十一”。李景汉就曾讲授过这一课程。李景汉与傅葆琛都曾担任过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学月刊》农林经济组的编辑顾问(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302)，共同参与塑造了学院的学术话语与研究方向。

三、从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到华北大学农学院：李世俊与南泥湾的开发建设

中国农业大学校史的第三个源头，是从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到华北大学农学院的系统。这一系统诞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其发展轨迹与革命战争的需要紧密相连，因而形成了与前述两个系统迥然不同的气质与传统：一种强调教学、生产与研究紧密结合，直接服务于革命战争与群众需求的实践主义传统。在这一传统中，李世俊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关键人物。

(一)南泥湾的开发与社会改造方案的提出

李世俊(1901—1962)，字子义，山西省万荣县人，中国农学与农垦事业的先驱者。李世俊于 1926 年考入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1932 年毕业，是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农业专门人才(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丛书编委会，2005：132)。毕业后，李世俊曾有一段特殊的经历。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为安置中原大战后裁汰的大量官兵，并推行其“村治”设想，自 1932 年起在绥远河套地区推动“屯垦西北，造产救国”运动，建立了一批实行“兵农合一”制度的“新村”。李世俊在负责此项工作的绥

西屯垦督办公署担任科长(解放,2002:222)。这段经历使他较早接触并实践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垦与组织管理工作,为其后来在延安领导南泥湾开发积累了宝贵经验。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李世俊联合几位高级知识分子及其子李力等六名青年,利用到西北考察的机会,于 1937 年 9 月毅然投奔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后经刘少奇介绍,李世俊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其具备专业的农学知识和难得的军屯经验,他被留在边区,受命筹办模范农场,历任陕甘宁边区国民经济部技正、边区政府建设厅主任、农业厅技术室主任、工业原料委员会主任等职,并主办过边区 1938、1939 年两届工农业成果展览,迅速成为边区农业技术工作的骨干力量(山西省万荣县志编纂委员会,1995:814)。

李世俊出生于晋南产棉区,深谙棉花生产技术,同时具备扎实的农学理论功底与丰富的实践经验。1939 年后,面对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日益严密的经济封锁,李世俊积极响应中共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他在边区政府的委托下,带领唐川、姚作农、丁景才等农业技术人员,对黄河沿岸进行了为期 59 天的详细考察。考察发现,沿河的吴堡、延川、延长三县光热资源优越,具备种植棉花的天然条件。李世俊将考察结果与推广植棉的具体面积、措施建议向边区政府作了详细报告。边区政府迅速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并任命李世俊为工业原料委员会主任,负责推动此事。此后,他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委托商人到国民党统治区采购棉籽,及时分发给农民,并给予技术指导,最终获得成功。从 1941 年开始,陕甘宁边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增加,到 1946 年,种植面积达到 35.1 万亩,年产皮棉 150 万公斤,使边区 200 万军民的穿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解放,2002:223)。这一成就充分展示了李世俊将农业科学技术与边区实际生产需求紧密结合的能力。

然而,李世俊最为人称道的贡献在于他对南泥湾的开发。1940 年,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乐天宇带队进行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其撰写的《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报告提及南泥湾一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具备开垦价值。与此同时,李世俊等延安农学界人士也向边区政府提出了开垦南泥湾的建议。最终,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勘察和推动下,党中央决定开发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边区政府建设厅随即派遣具有屯垦经验的李世俊负责建立南泥湾垦殖处(华北大学农学院院史编委员,1995:57)。

1941 年,李世俊正式出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南泥湾垦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农场场长(后任八路军总部管理处处长)。他白天深入南泥湾实地考察,晚上伏案计算分析调查数据,从土地分配、河道疏浚、稻田开发、造林护林、道路开辟到建立市场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详尽和科学的规划与具体安排(解放,2002:224)。在李世俊的科学组织和三五九旅等部队官兵的艰苦奋斗下,昔日人迹罕至、荆棘丛生的“烂泥洼”,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变成了“粮食堆满仓、牛羊遍满山”的“陕北好江南”。朱德总司令于 1943 年 1 月 11 日亲笔致信李世俊,赞扬他所取得的优异

成绩，并嘱咐他继续加倍努力，完成更重大的任务。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也经常与其商讨农业耕作技术和牲畜饲养问题。由于他对边区农业和部队生产的巨大贡献，部队和边区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写诗赞扬："群众爱戴李主任，计划周到多辛苦，殷勤招待诸同志，荞麦煎饼高粱酒"(山西省万荣县志编纂委员会，1995：814)。

更为重要的是，李世俊并不仅是一位技术专家或生产组织者，他还是一位具有深刻社会关怀和理论思考的实践家。在扎实的南泥湾屯垦实践基础上，他系统地总结了"南泥湾政策"。1943 年，《解放日报》刊载了李世俊撰写的长文《怎样领导与执行南泥湾的政策——南泥湾全部工作的发展》。该文结构完整，论述深入，包括"关于全部土地分配区划整理问题""关于疏浚河道治水节流蓄水等方面""关于森林树木开发与保护方面""关于这一地区社会发展前途的展望"四个部分，对南泥湾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开发、保持和利用做了全面总结与规划。

文章的前三部分主要涉及土地、水源、森林等具体自然资源的科学开发与利用办法，体现了其农学专业的严谨性。例如，他认为"关于全部土地分配区划整理问题"是一个新开发地区最基本的问题，"全部土地应作合理的规划与配列，农地、林地、牧地各应占全部地积的比例数"。他提出一般性的规划原则：农地应占全部土地 50%，林地占 20%，牧地占 30%。他强调，一切土地分配的原则"应该是以居住与土地的联(连)接性、工作与管理使用的方便性、全部土地的好坏配列的调整性为依归，站在开发与建设任务的共同立场上，不应再有争执和纠纷，应当是互相帮助与工作关系上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和配合"(李世俊，[1943]1994：385)。

文章的第四部分"关于这一地区社会发展前途的展望"，是李世俊理论思考的精华所在，集中阐述了他基于南泥湾实践所设想的农村社会改造方案。他认为，南泥湾社会发展的前途和远景可能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农村中个体农民发展后的"新村式"景象；第二种类型是机关创办的公营农场发展壮大的"庄园式"景象；第三种类型是战斗的屯田部队发展的"建立公共而富有、大家务新"景象。值得注意的是，李世俊在这里有意识地将自己所设想的社会方案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几种思潮作了明确区分。他批评了"空想派"(企图把社会发展停留在一个"理想概念"上，不从现实出发)和"反动派"(企图保留旧的社会制度遗规，阻碍社会进步)。他也承认自己的方案与"乡建派、平教派"(指梁漱溟、晏阳初等人领导的乡村建设派别)有某些类似之处，"因为大家都是从社会的物质基础(小生产)所出发"。但他强调，自己的方案与这些派别有着根本不同(李世俊，[1943]1994：388)。

在李世俊看来，一个可行的社会改造方案，必须"清楚的了解了目前社会的物质基础(个体农民的小生产)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另一方面又不忘记在此社会基础上一定的先进的政治教育的启导作用与一定的经济组织形式的诱发作用"。他明确认识到，南泥湾所实践的，"适合这一社会的物质基础的一切作法是一个过渡的作法，是

替下一阶段社会(更前进的社会制度)创造下必要的成熟的条件”。也就是说,他并不将南泥湾的模式视为永恒的、终极的理想社会,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先进的政治力量(党的领导)和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部队屯垦、公营农场、互助合作等),引导小农经济向更高阶段社会过渡的实践探索。同时,他强调南泥湾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实验田,它应当随着整个革命形势的转移、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边区的进步而发展,绝不能把它单纯地与外界隔绝来看待;它将是边区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雏形与模范地区,“它所以而且必然发展在一般社会前面,是可以断言的”。文章最后,他充满信心地提出了“为屯田制度而奋斗”“为执行党的南泥湾政策而奋斗”的口号(李世俊,[1943]1994:389 – 390)。

李世俊的这篇文章清晰地表明,南泥湾的开发不仅是一项成功的经济生产运动,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改造实验。它试图探索,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将先进的农业技术、科学的组织管理、新型的生产关系(集体劳动、公私兼顾)以及前瞻性的社会理想,融入具体的农村开发实践之中,从而为未来社会的建设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二)“三位一体”办学方针在农学院的确立与推广

李世俊等人的实践,深刻影响了后来华北大学农学院的办学精神与方针。这一影响,主要通过乐天宇等与李世俊并肩工作的农学家,在学院的教育实践中得以实现。

1943 年 11 月,延安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其生物系改为农业系。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开始向华北及华东解放区转移。辗转至晋冀鲁豫边区的农学系师生,加入了在此筹办的北方大学农学院。北方大学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晋冀鲁豫边区设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校长为历史学家范文澜。1947 年 3 月,北方大学农学院在山西省长治市正式成立,由乐天宇担任院长。农学院成立的宗旨为“为了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早日来到,开展农村大生产运动,以保证战争人力物力的资源”(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584)。在这一时期,乐天宇鲜明地提出了教育、研究、生产“三位一体”的办学方针。这一方针正是对延安时期自然科学院、南泥湾垦荒以及边区大生产运动成功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它强调高等教育必须与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相结合,反对脱离实际、闭门办学的旧教育传统(华北大学农学院院史编委员,1995:93)。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农学院采取了多种创新形式。例如,为广泛推广农村技术教育,学院制定了农村基点教育工作办法。1948 年 3 月下旬,由研究室的研究生、边区合作厅的技师,以及农学院制糖系和畜牧兽医系的学生,共同组成农村技术教育工作队。工作队下设八个分队,由分队长带领长期班学生三十余人、短期班学生八十一人,共计一百二十余人(包括各机关派来学习的干部),分赴太行、太岳地区的各个基点村开展工作。在这些村庄,他们组织农民进行甜菜种植、兽医防治、农业技术改良、

森林保护等各项生产工作。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在瓦窑堡的工作经验，“以农村为学校，以广大的农民既当教员又作学生”。生产组织普遍采用合作社形式，设立糖厂、养猪棚、烤烟房等，这些组织既是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也是技术推广与合作组织。工作队的教员和学生，都由所在地的党政机关统一领导管理。他们既是农学院的师生或政府机关人员，同时也成为该村的一员，为群众服务(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588)。

为了进一步落实“三位一体”的方针，农学院在扩大教育工作站、实验地及兽医院的同时，还自力更生设立了各种工厂，如农业机械厂、兽药厂、制糖厂等。学院还积极引进外部智力资源，曾聘请美国友好人士韩丁(William Hinton)等讲授农业机械和家畜人工授精技术。其间，徐纬英等技术人员对甜菜栽培与制糖技术进行了反复实验，成功改进了糖的提炼与结晶方法。北方大学农学院这种深入群众、结合实际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做法，深受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的赞赏：“我区足资学习的推广方式是北大农学院(北方大学农学院的简称)他们经过农场试验(农院并不仅在农场试验)成功的优良品种，及群众目前有条件接受的科学知识，用群众路线的方式，到群众中去推广，是完全对的”(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588 - 589)。

1948 年 7 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晋察冀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连成一片，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也随之合并，成立华北大学。1948 年 11 月，北方大学农学院正式改为华北大学农学院，迁往石家庄，原长治校址设分院(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602)。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李世俊与华北大学农学院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当时，李世俊正受命组建华北人民政府所属的华北农事试验场(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前身之一)，并被任命为场长兼党总支书记。他与农学院院长乐天宇商定，“农学院从太行山下来后，在石家庄可以到华北农事试验场办学”。该农事试验场不仅将主楼(该场唯一的一座楼房)全部让给农学院使用，而且将其余平房划出一半以上交农学院使用(这一半以上的房子，也比农学院在长治时的所有用房多出两倍)。场、院两家关系融洽，在一年多的共处中，从未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农学院迁至石家庄后不久，正值新年，农事试验场领导设宴招待农学院的教师干部，李世俊场长还亲自为这些同志接风洗尘(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595)。这段佳话是教学、科研与生产机构紧密协作的生动体现，也象征着李世俊所代表的实践传统与农学院教育事业的深度融合。

在乐天宇的带领下，华北大学农学院苦心经营，艰苦创业，不到两年时间，已由原来的十余人发展到四百余人。至 1949 年 1 月，华北大学农学院从长治完全迁往石家庄西郊农场时，学生人数已增至六百一十余人。学院下属的兽医站、兽医院发展到三十多个，糖业工作站、糖厂达二十多个。这些机构不仅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促进

了边区农业和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切实落实了学院教育、科研、生产“三位一体”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教育方针,为解放战争和边区大生产运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与人才支持(华北大学农学院院史编委员,1995:94)。

四、结束语

回溯 1905 年至 1949 年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早期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条并行的线索,它们源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学术网络与历史使命,却共同汇聚成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独特的学术品格与精神气质。

第一条线索,是以严复为代表的,从京师大学堂农科到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学理传统。严复以其深厚的“群学”思想为基础,从国家治理、社会有机体演进与文明存续的高度,系统论证了农业的根基性地位,提出了“自居农国”的治国方略。这一传统,赋予农业超越经济产业的深刻社会学意涵,使其与国家富强、社会秩序和文化认同紧密相连。章士钊继之提出的“以农立国”论,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思想脉络,影响了此后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诸多思考。这一传统为中国农业大学的社会学注入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和深厚的人文关怀。

第二条线索,是以李景汉为代表的,从清华学校农科到清华大学农学院的经验传统。李景汉通过引入并实践社会调查方法,特别是其主持的定县调查,将社会学研究牢牢扎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经验现实之中。傅葆琛等人对农村社会学课程的引入与农村建设实验区的推动,进一步巩固了这一传统。它为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奠定了严谨、求实、注重田野的经验研究根基。

第三条线索,是以李世俊为代表的,从延安自然科学院到华北大学农学院的实践主义传统。在革命战争的淬炼中,这一传统将农业教育、科学研究与大规模的生产运动、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三位一体”办学模式。李世俊在南泥湾的开发实践中,不仅展现了农业技术组织管理的卓越才能,更从理论上思考并提出了基于现实物质基础、引导社会向前发展的改造方案。这一传统充满了强烈的实践导向、群众路线和革命精神,它强调知识服务于行动,研究服务于建设,教育服务于人民。

这三重传统并非彼此隔绝,而是在 1949 年三校合并之后,相互碰撞、融合,共同塑造了新中国第一所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的社会学基因。它们共同勾勒出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从思想萌芽、理论探索到学科初步建制化的早期轨迹,并深刻揭示了这一学科自诞生之初便具备的鲜明特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注重学理探究、社会调查与实践改造的学术风格与研究特色。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的早期发展,本质上是一部在农本思想指引下,围绕乡土中国的现实困境与治理需求,逐步构建其知识体系、研究方法与学科认同的历史。它生

动体现了“农业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生成逻辑：其问题意识紧密呼应国家与乡村重大关切，知识构建高度依托田野实践与理论反思的互动。这种“扎根乡土、回应现实、知行互构”的模式，不仅代表了农业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围绕本土重大议题而形成的独特知识生产路径，也塑造了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关注“三农”与发展、重视实证调查、强调实践应用的学科特质与学术品格，并延续百廿。今天的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学科传统，更在农村社会变迁中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丰富学术议题，构建新时期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研究体系。同时，它持续强化服务社会和回应国家需求的能力，彰显了学科在理论创新与实践贡献上的双重价值，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学术力量。

[参考文献]

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1990. 北京农业大学校史(1905—1949).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蔡远渊，师桂芳，赵竹村，等，2019. 图说农大.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傅葆琛，1983. 我与平教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 11 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何雪吟，2023. 在多元共融中走向“中国化”——老清华社会学系的调查传统. 魁阁学刊 (1)：161 – 179

洪大用，黄家亮，2019a. 李景汉文集：第五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洪大用，黄家亮，2019b. 李景汉文集：第六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华北大学农学院院史编委员，1995. 华北大学农学院史记：1939—1949.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李景汉，[1926]2019. 平民教育运动的社会调查//洪大用，黄家亮，组编. 李景汉文集：第六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景汉，[1927]2019. 农村调查运动//洪大用，黄家亮，组编. 李景汉文集：第六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景汉，[1983]2019. 回忆平教会定县试验区的社会调查工作//洪大用，黄家亮，组编. 李景汉文集：第六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菊花，2014. 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的图书馆建设思想与实践.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李世俊，[1943]1994. 怎样领导与执行南泥湾的政策——南泥湾全部工作的发展//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二). 内部资料

梁漱溟，[1930]2005. 主编本刊《村治》之自白//中国文化书院，编. 梁漱溟全集：第 5 卷.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马学军，2021. 民本、有机与演化：严复“群学”思想探究. 社会学评论(2)：51 – 69

梅贻琦，[1933a]1993. 在 1933 年度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刘述礼，黄延复. 梅贻琦教育论著选.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梅贻琦，[1933b]1993. 请拨圆明园遗址俾充农场及院舍的呈文//刘述礼，黄延复. 梅贻琦教育论著选.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1991.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山西省万荣县志编纂委员会,1995. 万荣县志. 北京:海潮出版社

史华兹,1996.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叶凤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汤佩松,[1949]2005. 清华大学农学院总况汇报//王步峥,杨滔,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史料汇编(1905—1949).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汤佩松,[1988]2005. 一个生理学科学家的回忆录//王步峥,杨滔,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史料汇编(1905—1949).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王步峥,杨滔,2005. 中国农业大学史料汇编(1905—1949).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闻翔,2016. 陈达、潘光旦与社会学的"清华学派". 学术交流(7):155 – 159

解放,2002. 万荣史话.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严复,[1895]2014. 原强//黄克武,编.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严复,[1898a]2014. 西学门径功用//黄克武,编.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严复,[1898b]2014. 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黄克武,编.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严复,[1903]2014. 译《群学肄言》自序//黄克武,编.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严复,[1904]2014. 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黄克武,编.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严复,[1909]2022. 与甥女何纫兰之二十一//马勇,徐超,编. 严复书信集.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严复,[1910]2022. 与甥女何纫兰之二十三//马勇,徐超,编. 严复书信集.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严复,[1912a]2022. 与熊育钖之七//马勇,徐超,编. 严复书信集.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严复,[1912b]2022. 与熊育钖之二//马勇,徐超,编. 严复书信集.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严复,[1912c]2014. 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黄克武,编.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严复,[1912d]2014. 原贫//黄克武,编.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严复,[1913a]2014. 进化天演//黄克武,编.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严复,[1913b]2014. 论中国救贫宜重何等之业//黄克武,编.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严复,[1913c]2014. 救贫//黄克武,编.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阎明,2004. 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章士钊,[1923]2015. 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郭双林,编.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章士钊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丛书编委会,2005. 百年人物.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Scholars and Disciplines: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a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1905—1949)

DENG Shihua

Abstract The year 2025 marks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AU) and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ociology as a discipline. Historically, the emergence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 at CAU predates its formal disciplinary establishment, with it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the university's own evolution and embedded within the broader historical processes of modern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traces the three historical lineages of CAU-from the Agricultural College of the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to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of Peking University, from the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of Tsinghua School to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from the Biology Department of Yan'an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to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of North China University-to examine three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Yan Fu, Li Jinghan, and Li Shijun.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ir academic contributions and 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 aiming to illuminate the distinct traditions they each established for sociology at CAU. Yan Fu laid a theoretical tradition at the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that situated agricultur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Qun Xue and national prosperity. Li Jinghan established an empirical tradition at Tsinghua, grounded in local communities and emphasizing field surveys. Li Shijun pioneered a pragmatist tradition in Yan'an's Nanniwan, integrating pedagogical,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Together, these three traditions shaped the early character of sociology at CAU, establishing from the outset an academic style and research orientation that emphasizes theoretical inquiry, social investigation, and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ology; Knowledge production; Early development